

我国海外投资的国际风险与对策建议 ——投资引进国和竞争对手视角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翁鸣

摘要：我国已从吸引外资的大国开始转变为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的大国，但是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对外投资经验，面临的国际市场风险不容忽视。有必要从投资引进国的视角，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经济风险以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借鉴竞争对手日本海外投资利益保护的经验和做法，提出我国企业应对海外投资风险的策略。

关键词：海外投资 国际风险 利益保护 日本经验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已从吸引外资的大国开始转变为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的大国，“一带一路”建设更是开启了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序幕。但是，国际市场风险远大于国内市场，如何在把握机遇的同时规避国际市场的风险，对我国政府部门、投资企业和对外投资银行，都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

担心引进高铁投资后的不利影响，当地政府出现犹豫不定的态度。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由国家主权等敏感问题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发生。例如，2014年5月，越南发生大规模排挤我国在越投资企业的暴力事件，这对我国对外投资带来了严重影响。

海外投资中的政治、经济风险因素

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渔翁”策略

政府干预和民族情绪的负面影响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的扩大，一些国家政府，特别是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进行严格审查，以阻止我国进入原本开放的竞争领域。例如，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海尔并购美国家电生产商美泰克等投资失败的经历，都是美国安全政策下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巨大负面影响的投射。这是因为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电信、电力等）涉及东道国的经济命脉，一些国家对于外国投资的限制，特别是对于来自中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是不难理解的。高铁属于重要的大型交通设施，一些国家在企盼引进高铁的同时，

一些国家追求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即刺激投资方之间恶性竞争，采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策略，先让投资方相争造成俱败，然后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或者选择报价最低、质量最优的方案，或者选择谁都不得罪的放弃方案。以墨西哥高铁项目为例，2014年11月初，墨西哥官方宣布中铁建设、中国南车联合四家墨西哥公司的联合体竞标成功，但在3天后墨西哥官方宣布撤销这项270亿人民币的高铁建设合同。同样，中国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的高铁投资项目也不顺利。《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印尼总统佐科把中日放在天平两端，为本国争取最佳条件。不可否认日本政府感到被佐科愚弄，这给使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日本基础设施出口战略带来沉重的一击”。最近，海外市场出现的新变化增加了

收稿日期：2015-9-28

潘晓明，《从墨西哥高铁投资受阻看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风险管控》，《国际经济合作》，2015年第3期。

国际投资的风险性和复杂性。

投资地政局不稳、法治不健全问题

有的发展中国家因政府更迭发生政策变化，有的国家出现政治局势不稳定，这不仅对还未竞标的环境，而且对已投资成功后项目建设，都形成了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例如，最近缅甸北部发生武装冲突事件，中国对缅甸的项目投资，特别是修建中缅高铁的设想都需要重新考虑。再如，墨西哥高铁项目开标后，日本和德国的公司以时间太短为由指责其程序不合法，这也成为墨西哥政府决定撤销招标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墨西哥政府最终以法律规则和招标程序不够透明的理由，宣布撤销中国—墨西哥联合投标结果，这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法律法规和招投标组织不规范，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外投资风险问题。

国内外政策不一致引发的投资风险

在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国内外法律、政策和习俗不一致导致的纠纷问题，这包括投资范围限制、生态环境保护、纠纷调解机制、当地劳工政策、税收财务政策等。我国一些企业投资前期工作不充分，甚至还习惯用国内思维方式，不考虑国内外政策和环境的差异，这容易导致投资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与经济损失。另外，投资地所在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产业政策趋势、汇率和利率变化等，都直接与我国对外投资效果产生影响。例如，2009年开始，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好转现象，外国资本也开始大量流入，导致部分国家资产泡沫产生，自2013年3月起，东南亚国家放慢经济刺激的步伐，通过调整经济和金融政策，压缩国内通货膨胀和资本泡沫。

他山之石：日本海外投资的体系、策略和特征

日本已积累了数十年的对外投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为了确保其资源、

能源供应，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海外进行开发性投资。70年代，日本以贸易和资本自由化为契机，实施了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来扩大海外投资市场的战略。同时，日本采取了把大量消耗资源、能源，易产生公害，破坏环境的产业转移到海外的方针。80年代，日本对外投资出现了第三次高潮，1989年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资国。投资额从1980年的46.93亿美元上升至1989年的675.40亿美元，增长幅度达1339%。进入90年代，日本对外投资有所下降，但是近几年日本加速扩大海外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和销售基地，并在全球投资中成为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例如，中日两国都在竞争墨西哥、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高铁项目。

“官民一体”的海外投资模式

虽然日本企业负责对外投资竞标和项目建设，但是日本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协议签订、信息收集、金融服务和鼓励措施等方面的努力，为其企业在海外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实际上，政府与企业在对外投资上各负其责，形成了“官民一体”的海外投资模式。另外，日本政府扶植的独立法人机构支持企业海外投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为海外投资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日本贸易保险公司提供有关保险服务，降低企业海外投资和贸易可能发生的风险。日本有关信息机构和海外学术机构，包括在外国大学中设立的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均为日本企业投资提供信息资料和分析报告，帮助这些企业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投资地情况，加强事先调查研究和可行性分析，力求避免因情况不明产生投资失误的结果。

日本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日本企业素以严格管理著称，其产品质量安全性也具有较高声誉，以高速铁路为例，日本新干线运行多年尚未发生过重大事故，这是一些国家在引进高铁时倾向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时，主要采用了“先抢占后求利”策略，以更优于竞争对手产品的造型、质

同上。
刘昌黎，《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回顾与展望》，《日本学刊》，1997年第2期。

量和价格，取得竞争的优胜。日本大企业为了进入海外市场，明确专门团队收集外国各方信息，包括政府政策、社会事件、科技进展、消费偏好、气候环境等，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获取有价值情报的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竞争策略。日本注重产业链的投资策略，培养企业集聚效应和产业竞争力。例如，日本丰田公司在泰国投资中，不仅投资建设汽车生产线、汽车销售连锁店、汽车维修连锁店，而且还投资橡胶种植园和轮胎制造厂，从而将汽车产业的制造、销售、服务环节扩至农业生产环节。

中日海外投资比较仍有差距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远超过日本，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但是无论海外投资经验、投资策略，还是企业管理，中日两国企业仍然存在着一定差距。除了上述方面之外，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中国投资企业必须纠正不正确的投资意识，澳洲 JLF 集团总裁约翰·菲茨杰拉德指出，“中国投资者习惯于把国内想法或做法带到国外投资中去，这样就在有形或无形中损失本来可以取得的更高的投资收益。其实，只要因地制宜转变投资观念，这些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指出，“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不能想当然地思考问题，要认识到两国之间的不同之处，理性地进行投资”。

对策建议

加强中国对外投资配套体系建设

加强与我国外交政策、“一带一路”、双边投资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相适应的对外投资配套体系建设，包括政策法规、咨询服务机构、情报信息服务等方面，形成立体性、多层次、多方面的支持体系。要注意发挥政策引导、专家参与、机构咨询的作用，改变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闭门

式决策的狭隘思维和工作方式。

加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培训

针对国内企业不熟悉海外市场的问题，国家有关部委应出台相关政策，通过培训帮助企业了解国际市场，尤其是海外投资中遇到的各种风险，以及如何防范风险发生的对应措施。强化制度追究投资决策失误者，改变盲目投资的思维和做法，避免轻率决策造成资产流失。


加强可行性研究慎重选择投资

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对外投资经验和能力，尤其是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官员腐败、社会动荡、管理低效、文化差异大等情况，这需要加强投资的可行性分析研究。科研单位、咨询机构可通过委托、竞争等方式，参与企业“走出去”过程，帮助企业慎重选择投资产业。

银行加强对海外投资审核

在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同时，银行业发挥自身优势和特长，加强对海外投资项目的信贷审核。借鉴国际银行业的主流业务，发展融资性对内担保、出口买方信用担保等多种担保方式。对于投资金额或风险较大的项目，则需要重点审核和监控。

发挥海外侨胞的作用和力量

我国侨胞是一支重要的海外力量，也是可以依靠的一支当地社会力量，特别是华侨领袖、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他们不仅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而且具有当地上层社会活动能力，他们能够弥补我国在海外长期驻点观察的不足。在发挥华侨力量的同时，扩大中国文化传播和设立交流机构，以形成可借助的海外支撑点。 

（责任编辑：韩晓萍）

《澳洲投资家直言：海外投资应避免中式思维》，《中华工商时报》，2014年11月5日。
同上。